

文化区域的 Wenhuaquyudefenyiyuzhenghe 分异与整合

张晓虹 著



上海书店出版社

夹马历史也里文七研究



ISBN 7-80678-135-8



9 787806 781357 >

定价： 24.00 元

陕西历史地理文化研究

文化区域的 分异与整合

张晓虹 著



上海书店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文化区域的分异与整合：陕西历史地理文化研究/张晓虹著. —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4.1

ISBN 7-80678-135-8

I.文... II.张... III.①历史地理-研究-陕西省-古代②文化史-陕西省 IV.K294.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105359 号

责任编辑：郑力民

封面设计：程 钢

技术编辑：毛志明

**文化区域的分异与整合
——陕西历史文化地理研究**

张晓虹 著

世纪出版集团 出版发行
上海书店出版社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ewen.cc www.shsd.com.cn

上海展望印刷厂印刷

开本 889×1194 毫米 1/32 印张 12.75 字数 372 千

2004 年 1 月第一版 2004 年 1 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 0001-3000

ISBN 7-80678-135-8/K·28

定价：24.00 元

序

——兼议自然区、行政区与文化区相互 关系研究之重要性

周振鹤

本书是作者在其博士论文的基础上修改而成的。以省区为对象的文化地理研究这是第三部了。与之同时,林拓关于福建历史文化地理研究的专著《文化的地理过程分析》也将一道出版,这是件令人高兴的事。张晓虹在本书里详尽地描述了陕西历史文化地理的面貌,同时也剖析了形成这一面貌的原因与机理,让我们既领略了活生生的文化形态,又理解了区域文化地理的一些基本原理。由于研究深刻,写作认真,读者很容易领会本书的精髓,因此我不在这里做太多的评价。由于陕西地理的特殊性,我倒想趁这个机会谈谈另外一个重要的相关课题。

对于中国历史上自然区域、行政区域以及文化区域三者相互关系的研究,是一个尚待开拓的研究课题。行政区域是在自然地理环境的背景上所划定的政治空间,因此在人为的政区与天然的地理环境之间就存在契合与否的问题。地理环境是由地貌、气候、水文、土壤和生活于其中的植物动物等因素组成的复杂的物质体系。中国历史上长期是一个农业国家,对于地理环境的地域差异有很深刻的认识,深知行政区域与自然区域的一致对农业生产管理有重要作用,因此在可能的情况下,总是尽量保持行政区域与自然区域的一致,以利农业经济的发展,维护封建王朝的稳定。但是长治久安又是中国历代统治者所追求的最高目标,这个目标是摆

在有利社会发展的目标之上的。而为了达到长治久安,统治者不断总结历史经验,认识到加强中央集权的必要性,在这种政治思想的指导下,高层行政区域与自然区域的背离越来越明显。其中陕西省就是这一背离现象的典型。

秦岭—淮河一线是中国最重要的地理分界线。此线南北两侧的地层、地貌、气候、水文、土壤、生物等自然地理要素都显著不同,因而历来被视为中国南方和北方的自然分界线,不但南船北马、南稻北麦由此线而判然,甚至分裂时期南北政权的对峙也常以此线为界。在元以前统一王朝之中,行政区域的划分基本上不跨越这条界线。但元代地方行政制度发生较大变化,作为高层政区的行省集民、财、军、政大权于一体,为了防止割据,省界的划定以犬牙相错为主导原则,行省的区划根本不考虑自然环境因素,而是根据军事和政治的需要来确定。蒙元征服中原是由北到南进行,因此行省的布置也采取北南拉长的方向。但中国的主要山川是东西走向,因此沿北南方向布置的行省就必然要跨越黄河、秦岭、淮河、长江、南岭等天然界线,因而包容复杂的地貌类型。同时,温度的变化与纬度的变化成函数关系,南北走向过长的行省也不得不纵贯不同的气候带。许多这样不合理的情况在明代以后得到纠正,但是陕西行省跨越秦岭的形势直至今日不变。因此以陕西地区作为自然区、行政区与文化区关系的研究对象是有特殊意义的,虽然本书的写作目的并不全在于此。

如果从一般直观的感觉来看,似乎在不少地区中,自然区域、行政区域与文化区域三者是相当一致的,但仔细分析却不然。文化区域比不得自然地理区域,后者虽不如行政区域那样有法定的确切的边界,但在经过学术论证以后,也有相对明确的范围。但文化区域主要是由感知而来的认识,当选取不同的文化因子作为划分文化区域的标准时,其范围也会有不同的形态。在各文化因子中,语言(或方言)、风俗、宗教都是比较重要的标准,而其中语言的

标准更显突出。根据现有的研究成果,我们可以分析几个实例来说明文化区域与自然地理区域以及行政区域之间的关系。我们将会看到既有三个区域相重合的情况,也有两个地域相重合、而另一种区域与此二区域背离的情况,还有三种区域互相间都不重合的情况。

陕西省就是行政区域与自然区域及文化区域相矛盾的典型。秦岭南北分属不同的自然区域,这一点在今天任何自然区划方案里都是一样的,在古代也是这样认识的。而从文化上看,关中文化与汉中文化也有明显的不同。关中方言属于中原官话,而汉中方言却夹有中原官话与西南官话的成分。而且时至今日,汉中地区仍然流行用西南官话演唱的汉剧,而关中地区却是秦腔占有明显优势地位。陕西内部的文化地域差异不但体现在关中与汉中地区之间,而且还存在于陕北与关中之间。陕北地区通行的方言是晋语,与关中的中原官话有相当大的区别,而与山西大部分地区有共同语言。就自然环境而言,陕北的黄土高原地貌与关中的渭河冲积平原也截然不同。因此,陕西其实是三种不同的文化区的无机的结合,是自然区、政区、文化区三不重合的典型。但是值得注意的是,自元代将秦岭南北划在同一行政区以来,经过七百年时间,在行政管理体制的作用下,关中与汉中地区的文化却又有逐渐走向一体化的倾向。这种倾向最明显表现在中原官话区的扩大。向北,关中方言侵蚀陕北的晋语,而使之有由北而南晋语特征逐渐削弱的现象,亦即入声字逐渐弱化的趋向。在汉中,中原官话则从东西两侧南下,使得西南官话的范围收缩到中部一带。同时,在汉中,在关中,都有秦腔的演唱,但倒过来,汉调在关中却呈逐渐萎缩的弱势。可以说,这种文化的整合过程至今尚未完成,因为要将原来自然背景与文化因素差异都有很大不同的文化区整合为一,是要经过很长的历史时期的。

相对陕西地区而言,湖南文化的一致性就比较显著,尽管湖南

的沅澧流域与湘资流域组成一个单一的高层政区仅有 300 年时间,远比陕西统合秦岭南北的时间为短,即使加上与湖北共处一个布政使司的时间,也还不足 600 年。但到底雪峰山所隔开的湖南东西两部分只是第三级自然区的差异,而秦岭所分隔的陕西南北两部分却是第二级的自然区域的差异。相比起来,当然前一差异要比后一差异小得多。加之,自中唐“安史之乱”以后,北来的移民到达荆南与江湘地区,使得沅澧下游与湘资下游的方言互相靠近,寢假至于今日,新湘语与西南官话的差异也比关中方言与汉中方言的差异要小。

在自然区域、行政区域与文化区域的关系中,尺度范围不同的地域有不同的情形。隋唐以后,相当一部分统县政区有长期稳定的现象,这种稳定性对于文化区的形成有极深刻的影响,因此文化亚区与文化小区往往与历史上的统县政区的范围相一致。本书就这一点,也给我们提供了极生动的例子。据本书作者研究,陕西内部的不少婚俗差异,截然以府一级政区为限。如在陕北高原区广泛颁布的喜头习俗,其南界恰与西安府与延安府的分界相一致。又如在以西安为中心的平原风俗区中,有一种礼后风俗,即迎娶第三日,新妇的姑姐婶妯都要到新郎家看望新妇,并送来饭食代替新妇下厨侍奉公婆。这一习俗的北界也严格地与西安府、同州府的北界为限。不但如此,戏剧剧种或同一剧种的不同流派的地理分布,也与行政区划相一致。分布在陕南地区的汉调二黄,其风格不同的三个流派,正好与清代的府相一致。秦腔同样如此,东路秦腔几乎只限于同州府内,中路秦腔主要流行在西安府,西路秦腔则以凤翔府为主要流行区,而且这种分布格局实际上与方言的分布相吻合。

本书的绪论说,该书的研究目的是要廓清历史时期陕西地区文化现象的空间分布格局及其形成背景。这一任务已经出色地完成,我们不但从书中看到了作者为我们展示的陕西文化地理的绚

烂色彩,也从历史演进中看到了这些色彩形成的过程。这一点不用我细说,读者都可以直接感受到。但是本书的意义远不止于此,还在于它透过文化地理的背景分析,让我们领会到了自然区域、行政区域与文化区域之间的关系以及三者之间的互动作用。这些读书体会是我在这里要特别强调的。

形成文化区域的是社会的力量,划定行政区域的是国家的行政权力,而自然地理区域的存在则是受自然规律所支配。因此文化区域与行政区域以及自然地理区域的关系,事实上体现了社会、国家与环境之间的关系。对于这一关系的研究至今显然尚未引起足够的注意。在本书的结论中,作者指出,在陕西文化地理中,自然环境起着文化现象的地域分异机制的作用,行政区域则在对区内的文化现象有着明显的整合作用。我想这个结论对于研究自然区、行政区与文化区的基本关系有着重要的启迪作用。

由于中国疆域辽阔,历史悠久,文化积淀深厚,在不同地区,这三种区域有着种种不同的关系,而且从历史上看,这一关系又是逐渐在变化的,例如由于政治需要随着时代的前进而发生变化,行政区不断发生变迁。在今天,如何调整行政区以促进现代化建设是一个重要的课题。同时在学术上,这项研究也可视为是联系自然地理与人文地理两大分支的桥梁,尤其因为行政区域是政治地理研究对象,文化区又是文化地理的研究内容,因此这一研究等于是将自然地理与政治地理及文化地理的有机关系进行深入探讨。对于如何更深刻地认识人地关系,使地理学成为研究人地关系而不单纯只是研究自然环境的科学,有重要的学术参考意义。而且研究三者的关系对于文化区的重新塑造,深化对中华民族文化的认识,也有一定作用。因此我希望本书的出版能引起读者对于类似研究的重视,并且提出更为重要的学术结论来。

目 录

序 ——兼议自然区、行政区与文化区相互关系研究之重要性···周振鹤

绪 论·····	1
第一章 陕西历史文化地理研究背景·····	14
第一节 陕西省自然地理概况·····	15
第二节 陕西历代政区沿革·····	18
第三节 历代陕西人口的发展及民族的变迁·····	29
第四节 土地利用方式及社会经济的变迁与陕西社会风气 的转移·····	56
第二章 陕西学术文化的区域发展及其地域差异·····	88
第一节 两汉时期陕西学术文化地理·····	89
第二节 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陕西学术文化地理·····	111
第三节 宋元时期陕西学术文化地理·····	124
第四节 明清时期陕西学术文化的地理分布·····	137
第三章 陕西方言地理格局与戏剧剧种的地理分布·····	158
第一节 陕西方言地理格局及其历史文化背景·····	158
第二节 陕西戏剧剧种的地理分布特点·····	180
第四章 陕西佛教的发展及其地理分布·····	199
第一节 十六国时期陕西佛教的传入及分布·····	201

第二节	南北朝时期陕西佛教分布的区域差异·····	206
第三节	隋唐时期陕西佛教地理特征·····	213
第四节	影响陕西佛教地理分布格局的主要因素·····	233
第五章	陕西风俗地理(上篇)·····	243
第一节	陕西婚俗的地域分布·····	243
第二节	陕西丧葬习俗的特点及其区域差异·····	261
第三节	陕西岁时民俗的区域差异·····	276
第六章	陕西风俗地理(下篇)·····	291
第一节	陕西民间信仰的区域差异·····	291
第二节	陕西民居的地域差异·····	322
第七章	陕西文化区的形成·····	350
一、	陕西综合文化区划·····	351
二、	文化中心——长安·····	357
三、	陕西文化区的形成机制·····	364
附录	太白山信仰与关中气候·····	376

绪 论

本书旨在探讨历史时期陕西地区文化现象的空间分布特征、文化区的特点,并揭示其文化现象的地理分布规律和文化区的形成机制。这一研究课题属区域历史文化地理的个案研究,目的是为中国文化地理学的学科建设提供实证。

中国地域辽阔,文化积累深厚,不但各省区的地域文化差异显著,即在一省之内也有相当大的区别,如陕西就是一个典型。到目前为止,我们对陕西内部文化区域差异的特点与形成过程知之甚少,且缺乏实证性的研究,这必须引起文化地理学研究人员的重视。因此,研究陕西历史文化地理,揭示其文化现象的地理分布规律和文化区的形成机制,就成为一件具有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的课题。

一、本书的一些基本概念

1. 陕西

陕西省位于我国西北地区的东部,北接内蒙古高原,南邻四川盆地。地势南北高,中间低:北为沟壑纵横、地形破碎的黄土高原,中部是平衍肥沃的关中平原,渭河蜿蜒盘桓,南部则耸立着高大险峻的秦巴山地,汉江与丹江穿行其间,冲积出大小不等、肥沃膏腴的串珠状山间盆地。无论是从自然条件,还是经济、文化等方

面,陕西都是我国区域差异最明显的地区。从文化地理研究的角度来看,陕西是颇佳的研究区域。

由于清代以后陕西的政区建置基本固定下来,未有太大的变化,故本书在研究过程中一般以清代的陕西政区为区域框架。

2. 历史

本书所谓的历史,主要指的是有文献记载的历史时期,总的原则是始自先秦,迄止清季(个别内容延伸到民初)。但为了凸现地域的思想,在论述中一般以清代的陕西省界为区域框架。而从研究的内容来看,各部分并不整齐划一,如佛教部分,主要分析唐代及其以前的地域分布特征;在划分风俗区与描述其特征时,则以明清时期为基准。这主要是根据所研究内容的特点和资料的分布而定,并不依作者的主观意愿,故读者可能会产生研究内容时期不一致的感觉,这是在所难免的。

3. 文化

文化是本书最难把握的基本概念。本书所研究的文化,源自文化人类学中的概念,即人类活动的思维模式和行为方式。但由于文化人类学中文化概念过于宽泛,因此本书选择用主导因子的方法,进行空间分布规律的研究,一些非主导因子略去不论,这样才能把握陕西地区文化地理的特质。

由于中国文化的特殊性,在西方文化地理研究中以语言、宗教为主要因子的作法,在我国文化地理研究中不能完全照搬。原因在于,中国人的宗教观念淡薄,虽然历史上佛教一度极为兴盛,也形成了对民众有相当影响的宗教派别,但就其整个历史时期而言,一般百姓可释可道,并不分辨其间的区别,故宗教对民众行为的影响远不能与西方比肩,其地域差异在中国不如风俗来得显著。而语言则不同,其在文化认同方面的意义,东西方并无差别。其间的

区别只在于,我国内地省区语言的分歧基本上表现为汉语方言的歧异。

除上述两个主导因素外,风俗在中国有着不同寻常的影响力,“千里不同风,百里不同俗”,一直是中国文化的重要观念,成为制约一个地区人们思维模式和行为方式的重要因素,研究文化地理的论著,也大都将风俗作为一地的主导因子^{〔1〕},这是与西方文化地理学研究极为不同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则表现在中国文化地理还要研究学术文化的地域差异,这是因为学术文化是最富有中国特色的文化要素,在古代,学术文化的发达与否,一直被认为是衡量一个地区文化水平高低的重要标志。

基于以上考虑,本书采用学术文化、方言、宗教和风俗四项内容作为研究陕西文化地理的主导因子。

4. 地域差异

凡提及历史上不合理的政区,必然以陕西为例。陕西南北跨三大自然带,分属不同的自然、经济、文化区域,作为行政管理确有其十分不便之处。不仅如此,在文化上人们也觉得十分别扭,如讲到陕西人时,一般会很自然地将其分为陕北、关中或陕南人,这就是建立在对这三个地区人们的行为方式明显不同的基础上的一种认知概念。而这种地区与地区之间的不同即为地域差异。

地域差异是一个地理学的概念,在本书中是指文化现象在不同地区间的表现形式。表面看来,陕西三大区域之间的文化差异非常明显。但实际上,其差异的程度如何,体现在哪些方面,不同的历史时期这些差异有什么变化,以及所谓不合理的政区建置对陕西文化区域的形成有何影响?这些问题都需要经过深入、细致地研究方能得出准确可靠的答案。

〔1〕 张伟然:《湖南历史文化地理研究》,复旦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

5. 文化区

在目前的文化地理研究理念中,主要有五方面的内容:文化区、文化扩散、文化生态学、文化整合和文化景观^[1]。其中,颇为关键的是文化区这一主题。

文化区(Culture Region)是指某种文化特征在空间上的分布。文化区一般有三种概念:形式文化区(Formal Culture Regions)、功能文化区(Functional Culture Regions)和乡土文化区(Vernacular Culture Regions)。形式文化区是一种或多种相互有联系的文化特征所分布的地理范围^[2];某种受政治、经济或社会功能影响的文化特征,其空间范围则是功能文化区,例如陕西各层级的行政区,就是一个个不同的功能文化区;乡土文化区(也称感觉文化区),即存在于人们头脑中的区域意识,这种区域意识是在对当地文化的感性认识中产生的,如一般人所说的陕西三大地区多属于这一概念。这三种文化区有区别,但也有可能重合。如陕西的乡土文化区分为陕北、关中和陕南,但具体到地域上时,人们多按政区划定:陕北包括延安、榆林地区,关中包括西安、渭南、宝鸡地区,陕南包括汉中、安康和商洛地区。这说明陕西乡土文化区与行政功能文化区是重合的。在以后的研究中,我们还可以发现,陕西的形式文化区基本上也与上述两种文化区重叠。

本书所论证的文化区基本上属于形式文化区,即根据方言、宗教、风俗、学术文化等多项主导因子的地域分布特征划分出来的地理区域,也可以说是各项单一文化要素的地域分布特点进行研究的一个总结。但是由于采用多项主导因素来划分文化区,各项

[1] Terry G. Jordan, *The Human Mosaic——A Thematic Introduction to Cultural Geography*, Harper & Row. 1990.

[2] 王恩涌:《文化地理学》,第42页,江苏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

指标的分布边界不可能完全重叠,这样确定文化区的边界就成为本书的重点与难点之一。

二、与本书有关的学术基础

对文化的研究是近 20 年来的热点之一,不仅在哲学界,在历史学界和地理学界对文化的研究也已成为一种时尚,这是由于学术发展的趋势和国内文化研究的薄弱造成的。

相对史学界与哲学界来讲,地理学界对文化的研究较为薄弱。虽然文化地理学在西方有近 80 年的发展历程,在国内却中断了很长一段时间,自复兴以来还不过 20 年。因此,个案研究较为缺乏,使得通论性的专著在许多方面不得不引介西方的研究案例〔1〕。总的来看,目前国内的文化地理研究显得空疏与粗糙。

由于文化史主要关注文化现象的发生、演变过程,而对文化现象在地域上的分布却不能给予应有的重视,以致不能全方位地复原文化现象在历史时期的面貌。但由于文化现象具有极强的继承性,研究文化地理不得不关注其源流与演变的序列,惟有如此,才能将文化现象的地理分布特点研究清楚、剖析透彻。可是,凡与历史有关的研究,首先需要耗费大量的时间翻阅浩繁的历史文献资料,这对于主要从事现代地理学研究的学者,无疑具有一定的难度。

因此,从历史文化地理角度进行研究的著作为数不多,但其中也有一些具有相当分量,如周振鹤师主著的《中国历史文化区域研究》〔2〕,该书从语言、宗教、风俗和人物等各类文化要素入手,对中国历史时期文化现象的地域差异及其形成的背景、原因和过程进行了深入、细致的综合研究,可以说是近年来文化地理研究成果的

〔1〕 王恩涌:《文化地理学》,江苏人民出版社,1992 年版。

〔2〕 复旦大学出版社,1997 年版。

体现。此外,10多年前周振鹤师与游汝杰先生合著的《方言与中国文化》^{〔1〕},作为首部从某一文化要素入手,全面分析文化现象与地理环境之间关系及文化扩散、文化整合、文化区的专著,其对文化地理的贡献已得到了学术界的高度评价,成为研究文化地理引用最多的一部著作。再有,台湾学者陈正祥的《中国文化地理》一书对大陆学界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这在赵世瑜、周尚意合著的《中国文化地理概说》中表现得较为明显。但是,这两部著作主要是从地域文化的角度论述了中国文化,其研究理念与现在通行的文化地理学有一定的差距。除上述著作外,以全国为范围的文化地理论著,还有张步天的《中国历史文化地理》^{〔2〕}、王会昌的《中国文化地理》^{〔3〕}等,但无所发明,主要是综述之功。

作为历史文化地理研究的一个主要领域,断代文化地理的研究起步较早,但后继乏人,成果不多。作为第一部断代文化地理研究的论著,卢云的《汉晋文化地理》^{〔4〕}是从学术文化、宗教和风俗(包括婚俗和乐俗两项内容)三个方面论述了自汉至西晋长达600余年间中国文化的嬗递及文化扩散的过程,堪称这一研究领域的杰出之作。除此之外,近年来出版的仅有程民生的《宋代地域文化》^{〔5〕},但该书是一部断代的文化史研究专著。尽管作者在《序言》中一再将地域文化与地理环境联系起来论述,但由于作者在具体分析中也没有将地域文化与地理环境有机地结合,因此,严格地来讲,该书并不属于文化地理研究范畴。

区域文化地理是文化地理研究的另一个重要领域,对构建中

〔1〕 周振鹤、游汝杰:《方言与中国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2〕 湖南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

〔3〕 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

〔4〕 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

〔5〕 河南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